

近代史学刊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章开沅 严昌洪 主编

第10辑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主办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近代史學刊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SSN 1003-0508



CHINESE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CHINESE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近代史学刊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章开沅 严昌洪 主 编

第10辑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主办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史学刊 第10辑/章开沅 严昌洪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
ISBN 978-7-5622-5975-6

I. ①近… II. ①章… ②严…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丛刊
IV. ①K25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9532 号

近代史学刊 第10辑

主 编:章开沅 严昌洪◎

责任编辑:古 沁 冯会平

编 辑 室:文字编辑室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upress.com>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字数:260 千字

开本:880mm×1230mm 1/16

版次: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数:1-1000

责任校对:罗 艺

封面设计:罗明波

电话:027-67863220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督印:章光琼

印张:10.5

印次: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7.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目 录

辛亥革命研究

- 丁健:小人物,大历史:辛亥革命中的袁克定 1
- 彭剑:清季唐瑒与革命派论战述评..... 11

专题研究

- 戚学民:翁同龢的学术宗主与交游兼论其对晚清学术的影响..... 21
- 黄忠鑫:清代以来汉水中游的商业中心及其变动..... 41
- 艾晶:清末民初家法族规对女性犯罪的制约作用分析..... 58
- 江满情:论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资本的同业联营 72
- 马陵合、王平子:申七事件:近代民营企业外债的多维解读..... 81
- 吴敏超:左翼的联合
- 以千家驹与“中国农村派”为中心的考察 94
- 阎书钦:民国学界对美国社会学理论的选择与融会:
- 对民国时期社会学中国化一个侧面的考察 107

学术争鸣

- 李培德:中国银行行史
- 档案、实物、诠释方法..... 127
- 洪振强:如何认识中国的理性民族主义
- 兼与叶江先生商榷..... 136

新著评介

何晓明:记忆是传承的责任 诠释是创造的光荣

——读罗福惠、朱英主编《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 147

王龙飞:简评《中国近代史史料学》…………… 150

李萌华:司法党化问题研究的一部力作

——评李在全著《法治与党治——国民党政权的司法党化(1923—1948)》…………… 155

龙心刚:近代中国商民运动研究的力作

——朱英教授著《商民运动研究(1924—1930)》评介…………… 162

小人物，大历史：辛亥革命中的袁克定^①

丁 健

内容摘要 袁克定作为袁世凯的大儿子，由于身份特殊，他在辛亥革命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这体现在：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应诏出山，袁克定便开始积极为其父谋划，为稳定北方政局，出力颇多；待袁世凯主和态度明朗后，又尽力活动，促成南北议和；外交上，奉其父意旨多次秘密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联络，助其父很好地处理国际事务；后来，面对南北共和之潮流，亦能积极促其父袁世凯接受共和。

关键词 辛亥革命 袁克定 袁世凯

我们常言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还原历史的真相，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袁克定就是一例。有关袁克定的研究，目前还停留在简单的批判上，做深入研究的尚不多见，传说和坊间传闻，要远远多于严肃的学术研究。袁克定作为袁世凯的大儿子，在历史中的作用虽然远不及袁世凯，但也并非无研究的价值和必要。袁克定(1878—1955)河南项城人，字云台，号焕愈，从小立下了宏大的志向，尽管年小体弱多病，“然好学不倦，未尝以病偶辍，始攻帖括下第后，顿悟时文不足为世用也，类集其旧书一炬毁之，乃博求经世之术及经史群籍。余事读兵法，学英、德、法、日诸国方言文字，延宏博之士闭户讲论十年，而学识孟晋”^②。后又留学德国，通晓英语、德语。历任农工商部右参议、右丞，开滦矿务监办，兼任董事长，后为外交部顾问。1914年帮助袁世凯主办陆军模范团，次年4月任模范团第二期团长。袁世凯死后匿居天津，1955年病死于北京。由于身份的特殊，其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不能忽视。为了把辛亥革命史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有必要对其做进一步的研究。一来可以更清楚的了解辛亥革命的复杂性，二来有利于丰富袁克定这个人物形象。本文仅选取其在辛亥革命中的一些活动，看看“小人物”在大历史中的作用，以求对其有进一步的认识。

^① 本文为张华腾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末新军研究》(批准号：09BZS029)子课题的前期阶段成果之一。

^② 袁克文：《洵上私乘》，大东书局1926年版，第15页。

一、为其父积极谋划，稳定北方政局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尽管决策荫昌、萨镇冰南下，但还是对前途不放心，因为北洋军不是谁都能指挥得自如的，于是，让袁世凯复出就顺理成章了。清廷起用诏下之后，袁世凯这边便开始忙活了，急忙召集幕府中人，商讨对策。当时，为袁世凯做过寿还未来得及走的亲信，各抒己见，集思广益。

袁克定告诉乃父，不必应命^①。他担心事机一旦平定，其父必有性命之忧。况且在野三年，袁克定也跟着生了三年的闷气：现在有难了，想起我们父子了，我们就是不出，看你们能撑几天。毕竟年轻气盛，思考事情极不周到。其实，袁克定的这种想法有点多余，也太看轻了袁世凯的实力。在这个时候，只要袁世凯能复出，势力做大做强不是谁能控制得了的，清廷也不例外。因为其拥有全国最精锐的部队，拥有最广泛的国内国际关系。所以，最终袁世凯力排众议，铁定应诏即起。袁世凯决定出山后，袁克定对其父的决策并没有不赞成，而是积极谋划布置；也许是在袁世凯的授意下，袁克定经常往返于洹上、京城两地之间^②。在京城，会见各种亲袁势力，为其父打通各种关节，并打探各种消息，这些都成为日后袁世凯决策的出发点。等袁世凯回到北京，荣升为内阁总理大臣时，袁克定活动得更更有劲，忙里忙外，参与了不少重大的政治活动。比如清帝退位问题就是一例。尽管当时清帝退位问题已是必然的事情，但究竟何日宣布退位，大家并不知晓，可袁克定心里就十分清楚，而且还很有信心地告诉别人，当时《申报》载“据袁世凯之子(袁克定)昨日(念四)告人谓：无论南京政府允受所拟各条与否，改革政体之谕，明日必当宣布”^③。事实也证明了袁克定所言是准确的。时人恽宝惠就认为在参与颠覆清室的密谋中，“他已是中坚分子”^④。这一点儿不错。

的确，自从袁世凯出山南下后，袁克定不仅为其父出谋划策，还为其父解决了不少后顾之忧。

首先，办团练以固家。

彰德是袁世凯经营多年的根据地，是带有极强的象征意义的。彰德的不稳，毫无疑问代表着袁世凯地位的不稳，袁世凯十分重视彰德的防御，因此除与河南巡抚宝棻商议保护外，还积极组织团练自保。当袁世凯不得不赴前线指挥督师时，十分关心的仍是彰德的安全。一方面，固然是自己的家人安危，一方面，则是担心洹上村的周全。再者，彰德是袁世凯的后路粮台，如失去，大局将不堪设想。彰德一旦不稳，可能会成为全世界的笑柄。

^① 王锡彤：《辛亥记事》，《辛亥革命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17页。

^② 据王锡彤的记载，袁克定明确往返京、彰的时间分别是：九月初三日前一次，初八日回彰；初十日去京，十三日(11月3日)回彰；英国外交档案中，根据袁克定会见朱尔典三次，一次是10月23日，一次是11月2日，一次是11月14日(九月二十四)，可知11月3日后袁克定至少又来京一次。所以在袁世凯回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之前，即短短的二十几天之内，袁克定往返京、彰至少三次。

^③ 《专电》，《申报》1912年2月23日，第2版。

^④ 方建文，张鸣主编：《百年名人自述——20世纪中国风云实录(2)》，线装书局2000年版，第126页。

所以袁世凯临走之前，一再布置彰德的安全防备，安排袁克定全权主持家务，要其必须倾全力捍卫彰德的安全。其实，袁世凯之担忧并非无必要，就在袁世凯动身前线督师不久，就发生了吴禄贞事件，据说吴的目的是袭击袁宅，“车已经生火待发矣”，由于其“部下皆袁公旧部，闻之愤怒，结合数十人刺吴死”^①。尽管如此，吴禄贞事件的影响仍不容低估。这对此时独力经营彰德的袁克定来说，震惊之余，不得不精心筹划，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后来，袁克定并没有让其父失望，除了联络河南地方有名的士绅、商人外，还与巡抚宝棻及当时驻扎彰德的王士珍商议^②，如何防止彰德被革命党或者袁世凯的反对派骚扰。当时，宝棻对此牵挂在心，也出力不少。他曾电奏陆军部让袁克定在彰德附近办团练：“查有农工商右丞袁克定，器识宏深，忠诚素著，治兵尤其家学，可否仰恳天恩俯念豫省关系较大，准其先在河北一带招募防军，办理团练，俟训练成军，再图进取之处，出自逾格鸿施。至所需枪弹粮购，应俟仰蒙俞允，再由宝与之妥筹商办，伏乞代奏请旨施行。”^③在兵荒马乱时期，陆军部也不好拒绝，于是袁克定积极操办团练，并设置布防，有效地防止了外部对彰德的干扰，稳定了袁世凯根据地的安全，也为袁世凯腾出手来对付前线的革命党提供了便利。

其次，袁克定有时候还主动为乃父冲锋陷阵。稳定山西、陕甘政局就是一例。因为在他看来，袁世凯成功，将来就有自己的好处。

随着局势的发展，南北双方逐渐达成共识，就是停战议和。尽管南北双方同意议和，可北方的局势并不乐观，山西、陕甘争斗并没有停止，局势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向，不得已，袁世凯从前线回京，把稳定北方政局作为首要任务。时人对袁氏此举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之为“老成谋国之识”^④。因为北方局势不稳，就会触及根本。而在稳定北方政局方面，袁克定做了不少实事，不仅侧身其中，还秘密派人往山陕、甘新地区游说。当时参与其事的刘孚若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袁项城督师湖北，予屡函劝其作非常举。胡君石青则随项城军中，劝项城作非常举者，到京后，与予宗旨大合；遂相率访袁云台，劝其速赞成共和。不数日，朱芾煌等秘自南中来商和议。有伍唐专使议和之举，予谓共和不日可成，而升允尚在西北，恐煽诱回部，为大局忧！秘陈之云台，云台颺之，即嘱予至甘肃，设法联合地方，先为之所。”^⑤另一位当事人景梅九的回忆也可以佐证：“此事由刘君孚若从北京来，始告我知道。孚若名为受袁克定氏委托来晋疏通，实则欲入甘肃，对回族宣布革命共和的利益，使他们赞成，以免兵祸，及到山西后，对我说明外边实情，略谓：‘昔日主张君宪的人，如范源濂辈，都极力提倡民主共和。袁克定密联民党，也劝老袁颠覆帝政，我曾与克定氏约，若项城主张共和政体，我可以劝山西民军首领承认项城为第一任总

① 王锡彤：《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

② 时王士珍驻扎在袁宅，据王锡彤记载主要是“主办袁军后路”。参见王锡彤：《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想必另一方面也是在守卫彰德的安全。

③ 《清陆军部档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8页。

④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56页。

⑤ 刘孚若：《刘君孚若自述辛亥革命密史一节》，《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8页。

统，并不以攻山西为条件。否则恐山西不能让步。”^①正是在袁克定的运作下，北方局势特别是陕甘、山西，有渐稳的趋向。为以后袁世凯可以腾出手来集中精力对付满族亲贵，抵御外交压力，以及在南北议和中占据优势创造了条件。

当然，尽管如此，袁世凯在做总统的道路上所面临的阻力还是很大的，有革命派，清皇室，内部守旧大臣，忠清的官僚等，在这些阻力面前，袁世凯就是不倒，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阻力被分化了，被某些人化解掉了，袁克定无疑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迫使清帝退位方面，袁克定的确表现得十分出色，其弟袁克文对其的评价是“大兄与有力焉”^②，即有很大的功劳。这并非溢美之词。当时，袁克定一方面从舆论上大造声势，另一方面联络军界给清皇室以压力^③，的确加速了清帝的退位。

二、参与南北和谈，促袁接受共和

袁世凯出山后，并没有抱着一定要镇压革命党的思想。他认为，革命党在各国都有，政治多改良一些，革命党就会少一些^④，所以他一直抱着君主立宪思想，因为他认为这比清朝君主专制政体要进步多了。再加上战争的残酷性，时间已近冬天，他在心痛自己党羽的同时，希望以传统招安的方式来解决革命，这样一举几得，大家各得其所。但是，实际情况远比他预料的复杂，招安恐怕不可能实现，和谈便不可避免。和谈是一项系统而持久的工程，在和谈中占据优势，恐怕是袁氏父子最渴望得到的，但谈何容易！为此，袁克定不少下工夫。当然，其最后促袁接受共和的动机，既是渴望尽快结束南北对立局面的反映，又是其政治上野心的重要施展。

首先，是与刚刚释放的小有名气的革命党人汪兆铭联系，布置南北和谈。一位美国学者指出，“汪开始结交袁氏之子，并很快与袁氏本人建立了关系”。“袁氏视汪氏为自己和革命党人之间的重要管道，因此极力拉拢，并鼓励其子克定与汪氏交往。”“从11月底到12月初，汪氏和另一位同盟会员魏宸组，经常秘密与袁氏晤谈。”^⑤后来，又“在京津间与杨度诸人发起国事共济会。希图妥协”^⑥。其实，从当时汪精卫的活动表明，他也愿意为袁氏父子效力，这多少也可以看出，革命有时候也得攀附权贵。事实上，这并不是汪兆铭一人的心态，革命阵营中迷恋袁世凯的亦不在少数。当时，黎元洪、黄兴为了促袁反正，甚至不惜以“大总统”相戴^⑦。这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还是革命势力软弱的表现，还是二者兼而有之？总之，“汪精卫穿梭于南北之间，积极促成议和，而且也是革命派中间反对

① 景梅九：《罪案》，《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页。

② 袁克文：《洵上私乘》，大东书局1926年版，第15页。

③ 王锡彤：《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页。其中有载：“十五日（1912年2月2日），晚至彭德，访袁云台，备述一切，并由云台授意前敌将士，照请愿共和不独立之策进行。”

④ 《袁项城洞知事变》，《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九月初四日，第7版。

⑤ [美]王克文：《汪精卫与辛亥革命，1905—1912》，《中外学者纵论20世纪的中国》，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

⑥ 居正：《梅川日记》，大东书局1944年版，第65页。

⑦ 卞孝萱辑：《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孙中山继续当选临时大总统最力的一个，但在举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一事上，他又是最早赞成者之一”^①。后来，胡汉民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不无心痛地指出孙中山之所以放弃政权，就是因为“精卫极意斡旋於伍廷芳、唐绍仪之间，而余则力挽先生之意于内。余与精卫二人，可云功之首，而又罪之魁”^②。当时，汪精卫为什么这么卖力地为袁氏服务，当然，首要原因在于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再便是袁氏父子对其的笼络。

其次，秘密派人与革命阵营讲和。袁世凯确定议和主张后，并没有公开，只是私下打探，以减轻由转变策略造成的压力。当时清廷主要意图仍是主张打压革命，所以就连袁世凯的亲密将领能领会袁氏意旨的亦不多。这样私密的事只有让自己的儿子担当，才最合适。身历其境的王毓超回忆说：“当第一军攻下汉阳后，战事暂停，江面沉寂，忽有一人乘民船由武昌方面渡江北来，被哨所士兵查获，怀疑是奸细间谍，询其姓名叫朱芾煌，身上带有‘钦差大臣袁’的龙票（即护照），难辨真假，冯命我同何恩溥推问，朱供称是受袁克定所派，秘密到武昌与黎元洪接洽谈和的。即将其拘禁，由冯国璋电讯袁世凯，袁回电之说‘此事需问克定’。”^③袁克定得知情报后，急忙去信解救这一重大棋子，他说：“华甫大哥爵帅大人：朱君芾煌系弟擅专派赴武昌。良以海军背叛，我军四面受敌；英人有意干涉，恐肇瓜分；是以不得不思权宜之计，以定大乱。今早有电，谅达记室。朱君生还，如弟之脱死也。此上。敬请勋安。弟定顿首。”^④一面是纪律，一面是和谈，当然和谈大过纪律，这一点袁克定心里十分清楚。所以敢拿着老子的招牌说硬话，尽管他并不是什么长官，可是由于他是袁世凯的儿子，大家都得让他三分。当然，这一次并不是个例外，袁克定“太子”作风一直如此，后来，段祺瑞也受过不少他的不恭举动。结果冯国璋只好下令放人。在当时谁敢这样“胡为”，袁克定就“为”了。后来，还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参与南北和谈的廖宇春就认为袁克定派朱芾煌去武昌运动民军是“于大局利害，独具只眼”^⑤。

后来，就是在廖宇春与黄兴顾问官顾忠琛之间的军方秘密和谈，也多有袁克定的身影。本来廖、顾之间的和谈，已经达成协议五条：“（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清帝。（三）先倾覆清政府者，公推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权利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省秩序。以上条件，彼此各书一纸，签名划押，互换收执。”^⑥但当时北洋军界有人反对议和，且当轴诸公，顾虑太深，南北双方都害怕“推袁之约中途失败，共和解决转成画饼”。于是，廖宇春等准备上书劝陈袁世凯“时机日亟，迫于燃眉，中国存亡，决于和战，官保躬膺政柄，身系安危，輿望所归，群生托命，正宜力维大局，早勿为左右所惑，致蹈危机”^⑦。选择谁来传递这个信息呢？他们一致

① 丁健：《袁世凯获得临时大总统的历史原因新论》，《武汉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②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69页。

③ 王毓超：《北洋人士话沧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④ 《袁克定致冯国璋函》，《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89页。

⑤ 廖宇春：《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页。

⑥ 《廖宇春助袁胁迫清帝退位的一件史料》，《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

⑦ 《廖宇春助袁胁迫清帝退位的一件史料》，《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

选定袁克定代陈。当然袁克定无疑是最佳人选,一方面袁克定倾力支持廖、顾和谈,值得托付;另一方面袁克定与袁世凯有着特殊关系,袁世凯自然信任他。而袁克定此时也希望南北统一,一致推选乃父当选民国大总统,所以也欣然接受他们的邀请。袁世凯逐渐地接受共和,“盖先生(廖宇春)与袁克定君迭次筹划大计,颇有密切关系也”^①。这一点儿不假。

其实,当时几次关于南北会谈的活动,袁克定几乎都参与其间。另一个例子是利用革命党人曾昭文。曾昭文字可楼,河南光山县人,1904年赴日本留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当时孙中山为总理,曾为书记官,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在日本时与王锡彤的次子泽放是同学,武昌起义时,回河南运动独立,为河南巡抚齐耀琳捕获,准备杀之。王锡彤得知此事,密告袁克定。袁克定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多得人才,便将其招来彰德,不仅没有问其罪,反将其放归,目的在于利用他疏通南北关系。后来曾昭文成为“俾通南北关键”^②,也是南北政局稳定后,北上迎袁专使之一^③。无论怎么说,袁克定笼络革命党人有术,大大促进了南北和谈的进程。

在南北和谈的后期,民众一致呼吁袁世凯推倒清朝,荣膺民国临时大总统。可由于袁世凯没有准备好,还不能过早宣布答应,此时袁克定也着急了,甚至有些飘飘然,催促其父尽快答应民众要求^④。关于此事,与袁世凯来往密切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有过这样的记述:“他的儿子(袁世凯同他有密切的关系,现在就住在他家里)极端仇视满族统治。不论什么时候他总是恳求他父亲放弃顽固态度,帮助建立共和政府。”^⑤结果,袁克定在外也逢人便讲其父就要做民国大总统了。其实,言外之意,即是我也要出人头地了。袁静雪就说袁克定“对旧时官场中的事情,非常熟悉通达……在政治上也很有野心”^⑥。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袁克定的这一公开宣扬,固然有利于人们对袁世凯意图的揣摩,但也造成了形势的复杂化。莫里循曾经对袁克定的冒失有过评论,他说:“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袁世凯竟不能继续左右形势。有些对袁世凯的不信任,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归根到底是他的脑袋里缺一根弦的儿子不谨慎,从一开始就称他父亲为未来的中华联邦共和国的总统。袁世凯的目标是当总统,我对此没有怀疑过。可是在袁世凯采取行动之前,他儿子的冒失已播下人们对他父亲不信任的种子。”^⑦莫里循的评价显然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袁克定表面上

① 《廖宇春助袁胁迫清帝退位的一件史料》,《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

② 王锡彤:《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176、185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④ 其实,早在武昌起义爆发不久,袁克定“即以共和政体几谏世凯。世凯恐左右疑之,斥使归里”。参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47页。

⑤ “莫里循致布拉姆函”(1911年11月21日),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796页。

⑥ 袁静雪:《我的大哥袁克定和二哥袁克文》,《魂断紫禁城:袁世凯秘史见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⑦ “莫里循致柔克义函”(1912年1月24日),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845页。

看似年轻鲁莽，却并不误事。因为其不假思索的言语，往往起到混淆视听的作用，有利于一方，就必然会对另一方构成威胁。

实际上，袁世凯一直在思考做临时大总统的合法性问题。而这种合法性如何获得，答案自然是对民国的贡献。所以，有时候的“乱”是袁世凯需要的，因为其结果就必然是稳定因素的呼声增强。而袁世凯认为自己有能力收拾乱局，成为民国总统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当袁克定在外大肆宣扬的时候，袁世凯并没有责怪、制止，却反而认为袁克定不再是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也能做大事，成大器^①。

三、斡旋外交，助其父处理国际事务

斡旋外交，这恐怕是当时袁世凯交给袁克定的重要任务。这也是极其私密的事情，就是与袁克定关系密切的王锡彤亦不了解其中的情况^②。总体来看，袁克定完成得很不错，没有出什么大的乱子。这表现在，袁克定到北京以后，除了联络京内亲袁势力外，还帮助袁世凯打开外交关系。多次会见袁世凯的老朋友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充当乃父的外交使者，为其父办成几件重要的外交事务。

第一，希望英国向清政府施加压力，给其父前线全权军事大权。关于此事，武昌起义发生后的第十三天，此时的袁世凯尽管已经答应清廷赴前线督师，但仍在彰德进行一系列必要的准备，包括调用旧员^③，筹饷，招兵^④等等，因为袁世凯向清廷所提之“节略八条”，清廷还未完全答复^⑤。袁氏一面坐等清廷的回音，一面想利用外力迫使清廷就范。可局势发展刻不容缓，为了探听各国特别是英国的意图，于是就让袁克定北上会见朱尔典。会谈过程中袁克定承父意直截了当地告诉朱尔典，“他的父亲一定不会到武昌去，除非摄政王让他直接统率一支远征军。他认为摄政王只是利用他父亲的名望，借以维持北洋军的忠诚，但不会给他实际权力，去镇压革命暴动”^⑥。这明显是在传达这样的意思：一是，我父亲不是不愿意去武昌镇压革命，而是怀疑清廷不会赋予前线指挥全权；二是，你们（英国）既然宣称全力支持袁世凯复出，不能仅仅停留在舆论呼吁的表面上，要付出实际

① 《致五弟袁世辅等函》，《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340~341页。

② 据王锡彤《抑斋自述》记载，几次去京、返彰都是他和袁克定一起的，但对袁克定会见朱尔典一事，毫无记载。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如果王锡彤知道的话，这么大的事他不可能不记。

③ “袁世凯致清内阁请代奏电”（八月二十九日），卞孝萱辑：《闵而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④ “袁世凯致清内阁请代奏电”（八月二十八日），卞孝萱辑：《闵而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⑤ 参见刘路生：《袁世凯辛亥复出条件考》，《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根据刘路生先生的考证，这八条分别为：“募兵、筹饷、不为遥制、调将三条、宽容被裹胁者、赈灾，共八条。”当时，清廷仅就募兵、赈灾、宽容起义者、调将三条很快有了答复，但对筹饷及不为遥制、前线事权统一迟迟未予答复。

⑥ “朱尔典爵士致坎贝尔爵士函”，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行动。而当时英国的确迫切希望袁世凯出山收拾局势,以确保其在长江流域的利益范围不受损害。自然,面对袁克定的说辞朱尔典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后来在英国公使的牵头下,各国公使达成共识,并向清政府施压:非给袁世凯全权不足稳定局势和平定南方叛乱^①。

第二,加强与英国的联系,渴望获得更多的帮助。1911年11月2日,袁克定再次拜访朱尔典。朱尔典记述了当时的谈话经过:“袁氏之子曾告诉本公使,说其父亲希望在当月16日赴北京。他有意占据汉阳作为战略点,好与武汉叛军谈判。若能说服武汉军接受条件,其他叛军必将一一归附。但袁氏亦承认,各地反清情绪激烈且又获得广泛的蔓延。妥协是否能达成,实在令人怀疑。据袁子称,袁氏本人之意,乃是迅速建立完全的立宪政府,保留清王朝的地位,而不让其掌握实权。但与之正间接洽谈中的国民大会不信任清室的诺言,坚持要解除清朝军队,作为一项保证。”^②从谈话内容,我们不难看出,其所含信息量很大:一、袁世凯的战略意图;二、武汉是否接收招降,令人怀疑;三、建立君主立宪困难重重。显然,这是在向英国方面通报信息,让英国人清楚袁世凯的行动,以便今后采取相应的对策。这种不断加强与英国的联系,互通声息,时不时地透露一下袁世凯的艰难处境,表明一下袁世凯所从事的活动与英国利益相一致,说一说袁世凯对各国态度不明确的疑虑的行为,无疑有利于得到英国政府的同情和帮助。事实上,朱尔典针对袁克定透露的这些信息,很快就采取行动,先是报告给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其次是与日本驻华领事伊集院商议对策,帮助袁世凯联络南方的革命党^③。

第三,就政体问题,探询英国的反应。出山后,袁世凯一直奉行以君主立宪政体为底线,但随着与革命阵营的深入交往却发现,革命党人坚持民主共和毫不妥协,一时南北陷入僵局。可是用兵实在危险,且兵力不足^④,再加上此时西方外交团体也向南北双方施加压力,要求尽快恢复秩序。袁世凯一时处境两难,为了弄清楚各国特别是英国在政体上的态度,11月14日,袁克定又代表其父访问朱尔典,“他父亲原本希望挽救清廷,现在却似乎已再不可能扮演此一忠贞角色,不知究竟应采取何种路线,实在极感困惑。全国民意皆要求废除王朝。黎元洪和武昌起义的领袖们,已促请袁世凯出来担任中华民国的总统,他们保证充分支持他。”“他相信上海、广州及其他革命据点亦皆会跟着给予支持。一般民意希望废弃王朝制度,并在热河或蒙古为清朝王族安排适当的赡养。袁世凯希望在清廷下面成立立宪政府,有关这一点,唐绍仪和袁氏许多旧友都拒绝与袁氏合作。”^⑤问题亮明了,袁世凯是想成立立宪政府,但是“唐绍仪和袁氏许多旧友都拒绝与袁氏合作”。怎么办?朱尔典告诉他:“此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保留满清王朝作为国家的象征元首,而

① 陈春华等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有关中国部分:1911—1912》,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08页。

②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页。

③ 参见邹念之:《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73页。陈春华等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有关中国部分:1911—1912》,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08页。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4~205页。

⑤ Jordan to Grey(Nov. 14, 1911), FO371/1095(45368), 转引自 Ernest P Young: *Yuan Shih-Kai's Rise to the Presidency*.

同时如所承诺地作立宪的改革。共和政体的政府在我看来仍不适合于中国，而是一项冒险的尝试。”得到英国的表态后，袁克定又把心窝里的话告诉朱尔典，“并且暗示说，他父亲可能被拥立为皇帝，而共和可能只是个过渡阶段”^①。当然袁克定有时表现出的幼稚举动，并不妨碍他准确地传达信息，也不妨碍英国一如既往的对袁世凯的支持。有必要指出，英国的这种支持当然是以维护本国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最后，朱尔典要求把袁克定告诉他的事秘密转告美国大使。袁克定欣然同意。在得到英国的态度时，袁世凯心里便有底了，急忙计划布置下一步的事情。

当然，事后朱尔典还是不放心的袁克定的言辞^②，就去直接求证袁世凯。袁世凯当然不会同意袁克定的说法，袁克定说的是自己的心里话，正式外交场合，袁世凯怎么会把自己的真实意图轻易流露。关乎此，朱尔典曾记述道：“袁氏谓，黎元洪坚持废除满清，而反对其所有建议。上海与南方革命军皆支持成立民国，然北方民意则赞成君主立宪，袁氏之意，在于领导赞同后项政策之党派。今资政院既已不足代表全国民意，袁氏建议于上海或天津召开各省代表大会，将其本人计划交由大会通过。袁氏以为若能结合北方各省支持其政策，将可形成一政府核心，借以终将赢得南方支持，或以武力收取。”最后还是不忘再次提醒朱尔典，“是否可能使其获得英国政界人士中具有实际经验者之辅助，并非担任其顾问，而是以朋友的身份协助其艰巨任务”^③。这可谓一语中的，其实，袁世凯让袁克定出面目的亦何尝不是想向英国寻求帮助呢！事实上，袁世凯也多从英国的意旨行事，后来之所以赶在旧历年内促使清帝退位，是因为，辛亥年十二月十八日，驻京外交团由朱尔典领衔照会袁世凯，“催请速向民国政府商定一切条件，务于年内和平解决”^④。

其实，袁克定除了运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帮助其父成就大业之外，还经常私下里同日本浪人及军界人士联系，日本人坂西中佐^⑤就是一个，一方面给他们带去情报^⑥，一方面利用他们获取革命党人的情报，为其父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

袁世凯向来认为外交无小事，况且武昌起义后，国内形势日趋复杂化，西方列强由于在华势力的不均衡性，表现的态度也不大一样。当时英国在华的利益最大，所以面对南北斗争的形势，绝不会漠然视之。袁世凯心里最清楚这一点，所以，出山后把外交的重点放在英国方面，但袁世凯有时候无暇顾及，就只得让其子代行^⑦，以试探英国及其他国家的

①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101页。

②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致英国外交大臣葛雷电”（11月15日），《档案与史学》2004年第3期。朱尔典认为袁克定之言带有试探的性质，并不可靠。

③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

④ “袁世凯又乞援于英使”，《申报》1912年2月5日，第三版。

⑤ 即坂西利八郎，日本陆军军人，后来晋升陆军中将，以通晓中国情况而著称一时。长期在中国活动。1904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受到袁世凯的重视，即被聘为兵书翻译官，辛亥革命当时任日本驻华武官。1912年8月受聘为袁世凯总统府军事顾问。

⑥ 邹念之：《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11页。

⑦ 袁克定的身份与地位是十分微妙的，因为他的话很容易被认为就是其父意旨的表达。

意图。这样,可以先让其儿子表明一种观点,如果发现对方怀疑时,袁世凯就亲自出马,或者圆场,或者纠正,或者重新亮明另一种观点。这对减轻袁世凯所面对的外国压力,起到很好的缓冲作用。总之,爷俩演双簧,效果还不错,辛亥南北议和时英国在穿线南北过程中的确帮了袁世凯不少大忙,而在推举袁为南北统一的领导人方面,朱尔典直言不讳地告诉英国外交部长:“承认袁世凯是保证中国有一个强固政府的惟一希望。”^①对袁世凯可谓推崇至极,就是明证。

事实上,那些看似不是很重要的人物,有时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辛亥革命中袁克定就起到了当时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在政局动荡不安、外界谣传很多的情况下,出山后的袁世凯极其需要听取各方面信息,但辨明真伪却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又很难做到事事亲历,苦于分身乏术。可袁克定就让他有了这一本领,为袁世凯跑前跑后,传递、收集、辨别情报,忙得不亦乐乎,且终于铸成良果。袁克定的表现,无疑让袁世凯觉得“孺子可教”,并心中窃喜,所以后来袁克定骑马搬家不慎摔伤时^②,袁世凯心痛万分。他在其致五弟袁世辅等函中说:“克定伤在脑部,甚重,如不求良医诊治,恐甚危险,或成残废,彰宅医多乱治,且甚嚣杂,极不相宜……万不可再乱治……兄年已逾五旬,当如此乱世,只此一子可支门户,诟不爱念。但为救其性命起见,不得不靠名医调治也,京津名医甚多,可延十位八位公同诊酌,必有完善之法。望切劝汝四嫂,万无固执,速同往治,早一日好一日。甚盼。近日万忙,不意添此意外心思,伤心运舛,徒呼奈何。”^③舐犊情深,可见一斑。其中“只此一子可支门户”,尤见袁世凯对袁克定的评价之高。也正是因为袁世凯十分信任自己的儿子,当后来袁克定积极怂恿其父称帝时,袁世凯不顾全国上下的反对,悍然称帝,结果身败名裂。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丁健:安阳师范学院)

①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4页。

② 袁克文:《洹上私乘》,大东书局1926年版,第16页。当时袁克定主持从洹上村往北京的搬家事务,在骑马回洹上村时,不慎跌落。袁克文记载“不期已入村矣,而马忽前蹶,大兄下坠,伤首,昏绝,举室惶骇,绝则三日”。

③ 《致五弟袁世辅等函》,《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340~341页。

清季唐璆与革命派论战述评

彭 剑

内容摘要 唐璆在晚清的时候是一个宗旨不定的“志士”，其思想常在“革命”与“改良”之间摇摆。他一度同情革命，并谋划过反清武装起义，但在与梁启超交往之后，又转向改良，1908年到新加坡，担任当地保皇派机关报《南洋总汇报》的主笔，与革命派展开过激烈的论战，论战的主题，围绕着革命问题与立宪问题展开，其核心观点是，要解决当时中国的难题，只能走立宪救国之路，而不能搞革命。这种论点引起革命派的猛烈反驳。并且，革命派针对他曾经同情革命一点，对他展开了很多“策反”工作，争取他放弃保皇，“回归”革命，但未能成功。

关键词 唐璆 革命 保皇 论战 新加坡

在中国历史上，辛亥革命是那种具有“分水岭”性质的事件。在它之前，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在它之后，则一变而为民主共和。然历史事实昭示，人类在结束君主专制之后，实有两种政治道路可供选择，民主共和为其一，君主立宪亦为其一。中国在结束君主专制之后，究竟该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这在辛亥革命前夕，实是一个未决的问题。当时的清廷，已经意识到“祖制”不可坚持，并启动“预备立宪”，希望把王朝改造成君主立宪的国家。而在野的各路志士，在中国究竟应该通过改革实现君主立宪还是通过革命实现民主共和的问题上，分歧非常大。有分歧就会有争论。于是，在辛亥革命前，不同主张的人们纷纷创办自己的刊物，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不遗余力地攻击敌对派的观点。这一论争，学界称之为“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两派大开笔战，其主要目的并非为了在学理上辩明是非，而在于扩大自己一派的影响，使读者认同自己一派的政治主张，参与自己一派的政治行动，以实现自己一派的政治理想。中国在结束君主专制之后没有走君主立宪的道路，而走上了民主共和之路，这一事实的出现，当然不能说是由于革命派在论战中战胜了保皇派所造成的，但这次论战，对于中国的政治道路选择，还是产生过实在的影响。

这场论战，时间相当长，战线也相当长。就时间言，有学者指出，早在1899年，论战就开始了^①，并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告成，而犹未已”^②，长达10多年。

① 元冰峰：《清末革命与君宪的论争》，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0年再版，序，第1页。

②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良友印刷图书公司1928年版，第41页。